

两周时期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区域差异研究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lat-stemmed Willow-leaf-shaped Bronze Daggers in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方晴 金梦

Fang Qing Jin Meng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南京, 210023)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内容提要: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或称巴蜀式青铜剑, 除在中国西南地区流行外, 其他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陕西和巴蜀地区不仅在出土数量上悬殊, 时代、形制和文化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异, 很可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具有作为实用和身份象征的双重含义, 且其作为身份象征的含义在陕西和巴蜀地区有所不同。在陕西地区,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是贵族、等级的象征, 而在巴蜀地区则仅仅是武士身份的象征。

关键词: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 地域差异 文化系统 贵族 武士

Abstract: The flat-stemmed willow-leaf-shaped bronze daggers, or the Bashu-style bronze swords, have been found in a number of places in addition to its popularity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related research and finds tha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mparis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ype of swor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refore, based on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lat-stemmed willow-leaf-shaped bronze daggers in Shaanxi and Sichuan is carried out and its dual meaning as a symbol of nobility and a symbol of warrior status is explained.

Key Words: Flat-stemmed willow-leaf-shaped bronze dagger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ystem; nobility; warrior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是现代考古学词汇, 是对具有同类特征的青铜剑给出的定名, 以区别于中原式青铜剑、鄂尔多斯式青铜剑等。其最大特征是整体呈柳叶形, 剑身后有短扁茎并有圆穿孔,

均无格。此外, 剑柄和剑身联铸, 绝大多数剑茎和剑身没有明显分界, 剑身中部最宽, 剑长为14—50厘米。该器过去也称“柳叶形剑”, 高西省指出除东北系统的短剑为曲刃外, 其他系列短剑几乎全为柳叶形, 区别仅在柳叶之窄宽与长短, 所以应称为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 以与其他类别相区别^[1]。由于这类

青铜剑在今天的四川和重庆地区发现最多，因此也被部分学者称为“巴蜀式青铜剑”。不过，其在陕西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并零星见于甘肃、贵州、湖北、湖南等地。

一、研究简史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最早出土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年代为商代晚期^[2]，使用一直延续到西汉，是两周时期一种非常重要的青铜兵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型式和分期、起源、纹饰和工艺。

1. 型式和分期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况不同。西周时期，主要分布在关中西部以宝鸡为中心的地区，目前普遍认为其他区域同类遗存是宝鸡地区向外拓展、影响的结果（表1）；东周时期则广泛分布于巴蜀地区。关于其分类与分期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到一个时期，而少有将两者综合讨论的。

钟少异最早根据是否折肩和扁茎有无穿孔将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分为两式，其中有穿孔者为主要型式^[4]。

高西省将陕西、湖南、江苏地区的凸框人面纹折肩短剑也纳入讨论，与柳叶形、折肩柳叶形共为三式^[5]。张天恩根据有无穿分为两型三式，指出无穿型为有穿型加工改造而来，并认为折肩人面纹剑仅仅是受到柳叶形剑的影响而不属于这一类别^[6]。谭银萍根据剑茎部的差异将其分为三型六式^[7]。就时代而言，该类剑流行时间较短，兴盛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几乎绝迹，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

童恩正最早将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剑分为巴蜀系统和西南夷系统，前者即本文讨论的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可分为两式，使用年代为战国至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在四川盆地流行^[8]。吕建昌则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具有地方风格的青铜剑分为六型九式^[9]。此外，李冬楠从剑身刻画纹饰入手，结合其他部位的变化，将战国时期的巴蜀柳叶形剑分为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及秦—西汉四个时期^[10]。

随着资料的积累，江章华将经过报道的185柄柳叶形铜剑略分为六型十七式，然后依据其所处的墓葬和遗址年代进行断代，最终将其大致分成商代晚期（初始期）、西周早期—战国早期（发展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成熟期）、秦—西汉早期（衰落期）这四个大的时期^[11]。这是少有的同时考虑两周时期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的研究。

2. 起源

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中原说、巴蜀说、西方说。

持中原说的学者认为，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发源于宝鸡地区的獫狁，属于中原文化系统，西周中期以后逐渐传入四川境内，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巴蜀式剑。童恩正、钟少异、宋治

表1 西周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统计表^[3]

序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墓葬或遗址年代	件数
1	1955—1957年	陕西长安张家坡	西周初期	1
2	1973年	陕西岐山贺家村	西周初期	2
3	1975—1981年	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	西周初期和中期	13
4		陕西岐山礼村	西周初期	1
5	1967—1972年	甘肃灵台白草坡	西周初期	4
6	1964年	河南洛阳庞家沟	西周初期	2
7	1972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	西周初期	2

民、朱世学等学者均持此种看法^[12]。江章华基于其分期的结果指出年代最早的柳叶形剑只见于蜀地，则可以肯定这种剑应起源于蜀地并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其他地区仅受到影响^[13]。高大伦、段渝、张天恩、孙岩、田伟、郭妍利、谭银萍持相同看法^[14]。高西省进一步指出，獠族是西周时期北上的巴人或蜀人，这种短剑可能本身就是巴人或蜀人的特征，使用时代早于西周，发源地在川西地区。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商代玉剑、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商代扁茎柳叶形剑提供了证据^[15]。尹盛平则认为獠族即巴人，西周时期的此类剑为巴式剑^[16]。卢连成认为柳叶形青铜短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Jemdet Nasr Culture）以及后来的苏美尔-阿卡德（Sumer Akkad）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17]。林梅村进一步指出其起源于近东，传入则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18]。林沅《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一文谈及苏雷美赫与伊朗鲁里斯坦出土的扁茎短剑，认为这一类短剑大概是由羌人传到了陕西，成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的来源^[19]。韩金秋赞同这一观点^[20]。周勇认为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往东经西亚、中亚后，分南北两条线路，辗转传入古巴蜀地区^[21]。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巴蜀青铜柳叶形扁茎剑源于古代氏羌民族^[22]，但钟少异认为由于羌族文化是周文化的重要来源和姬姜融合，该类剑也可以说属于周文化^[23]。

3. 纹饰和工艺

关于纹饰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纹饰进行分期和断代、纹饰的内涵研究、纹饰（主要是剑身虎皮斑纹）的工艺研究、符号的解读。巴蜀地区柳叶形青铜剑的纹饰丰富多彩，以虎纹和手心纹最为典型，另有相当部分可能为符号的内容。其中关于虎纹的研究较为充分，通常认为与巴蜀的虎崇拜有关。关于剑身纹饰的制作，学者提出了鎏锡铅法、锡汞法、三氯化铁溶液蚀刻等不同的看法^[24]，目前尚处于争论之中。

除以上三个方面外，还有关于族属、生产与流通、剑鞘等方面的研究。

二、区域特征：陕西和巴蜀的对比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文化内涵不是单一的，陕西和巴蜀地区不仅在出土数量上悬殊，时代、形制和文化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异，很可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表2）。通过上文的学术史回顾可知，以往研究较少将两者综合或对比研究。江章华汇总了考古发现的185柄剑，并对其中的110余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陕西地区18柄，四川地区87柄）^[25]，现拟以这些材料对两个地区的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文化内涵加以分析。

1. 形制差别

长度的差别。如图1所示，横坐标为出土地点，纵坐标为根据各地点出土青铜剑的长度绘制的箱线图，着色部分代表集中分布的长度区间。其中，部分数据为残长，但是陕西地区仅一柄为残长数据，其余残长数据均来自巴蜀地区。可见，巴蜀地区出土的柳叶剑要远远长于陕西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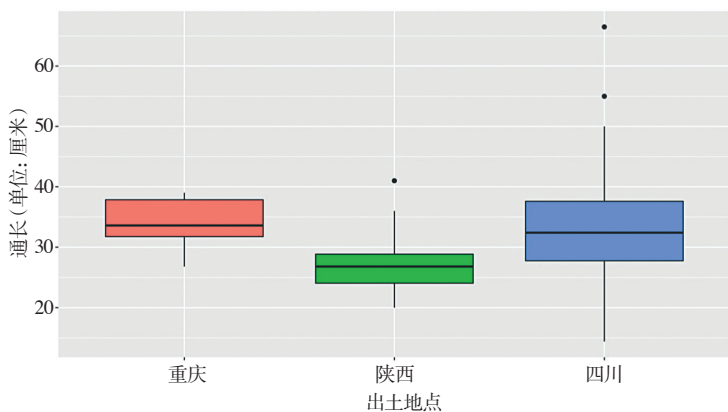


图1 重庆、陕西、四川出土柳叶形剑长度比较

纹饰的差别。首先是纹饰使用数量。陕西地区18柄柳叶剑中仅4柄有纹饰，占比22.2%，巴蜀地区87柄中36柄有纹饰，占比41.3%。其次，纹饰的具体内容也不相同。巴蜀地区以剑身的虎皮斑纹和近茎部的虎纹最具特征。此外，还有手心纹、水波纹、蝉纹等。宝鸡竹园沟M4：55柳叶形剑近茎部两面饰对称兽头，以云雷纹衬地；M20：35柳叶剑近茎部饰蛇纹，尾部下垂至剑身^[26]。陕西勉县收集到两件，一件剑身双面饰龙纹，其中一面有一个符号，报告认为是巴国文字；另一件剑身密布阴刻卷草纹，近茎部饰虎头纹^[27]。这两柄剑很可能是从巴蜀流入陕西的。如此，目前所见陕西地区有纹饰之柳叶剑仅二，且其纹饰为典型的中原纹饰。

穿的差别。虽然总体都是以茎上两穿为主，但是巴蜀地区存在无穿和三穿的情况。

2. 出土背景

陕西和巴蜀地区扁茎柳叶形短剑的出土背景不尽相同。就墓葬而言，陕西地区的均出土于高等级大墓。就位置而言，除了两件收集、两件位置不明外，其余10件有8件出土于强国墓地^[28]，位于墓主腰腹部，且墓主均为男性；1件出土于秦代墓葬，位于棺北侧中部^[29]；1件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在棺盖之上^[30]。巴蜀地区柳叶剑的出土背景则不见规律性。在高等级和相对低等级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出土位置多样：墓主腰腹部、二层台、腰坑内、棺或墓四壁的中部或某一侧等。值得一提的是，将扁茎柳叶形短剑放置在墓主腰腹部的墓葬并不全是高等级墓葬，这一点和宝鸡地区有所不同。孙岩对以上现象进行了解释，他

表2 陕西、四川地区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对比

地区 时代	陕西	四川
商代晚期		 1
西周早期	 2  3	
战国早期		 4  5
战国中期		 6
战国晚期		 7  8
秦	 9	 10
西汉		 11

注：1. 成都十二桥 I T4⑫：5 2. 宝鸡竹园沟BZM4：55 3. 宝鸡竹园沟BZM20：35
4. 四川大邑五龙M2：22 5. 四川大邑五龙M2：18 6. 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
7. 四川荣经同心村M2：13 8. 成都市金牛区M1：3 9. 陕西凤翔高庄M18：1
10. 巴县冬笋坝M50：11 11. 四川绵竹M2：18

认为柳叶形剑是强国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在其他地区则只是贵族的喜爱之物^[31]。徐坚进一步指出，柳叶形青铜剑有两种象征意义：以强国墓地为代表的柳叶形剑广泛出现于大中型墓葬中，且使用方式高度一致，一墓一剑且位于腰腹部，这是作为文化归属的使用方式；在其他西周时期贵族墓葬中则为青铜兵器组合的一部分，数量少而且仅见于最高等级墓葬，构成作为宝物或者威望物流通的类型^[32]。

巴蜀地区则存在截然不同的情况。范晓佩指出，兵器是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较为重要的一类随葬品，但其等级是通过兵器种类的多少或含有戈的兵器组合来确定的^[33]。李冬楠认为，巴蜀式柳叶形剑一直作为实战兵器使用和随葬，是墓主人军人身份的象征^[34]。由此可见，此类剑在巴蜀地区只是普通武士的象征，不具有等级的差异。这也可以解释巴蜀地区柳叶形剑出土背景的不规律性。

三、双重含义： 实用与身份象征

由以上讨论可知，扁茎柳叶形青铜

短剑具有实用和身份象征的双重含义，且其作为身份象征的含义在陕西和巴蜀地区有所不同。在陕西地区，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是贵族、等级的象征；而在巴蜀地区则仅仅是武士身份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差异导致了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在两个地区的形制和纹饰、在墓葬中的位置、所代表的墓主人身份等方面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时代背景决定的。首先，战争形式的不同导致了武器的使用不同。西周时期以车兵和步兵为主，扁茎柳叶形短剑作为一种近身武器，适用于短兵相接的场景，因而具有明显的实用性；战国时期则不然，相比短剑，长剑开始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实用器常常成为身份的标志，因此西周时期宝鸡地区的此类遗存更可能成为身份、地位的代表。谭银萍指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剑可能具有一定的刑罚功能^[35]。这更意味着只有少数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拥有并以之随葬。其次，是青铜的普及程度。相对而言，西周时期的青铜资源更为珍贵，这决定了只有贵族才能配备青铜武器，因而扁茎柳叶形剑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标志贵族身份、等级的作用；及至东周，铜料的获取和铜器的铸造相对容易，青铜武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因此在巴蜀地区仅成为武士身份的象征。综上所述，短剑的实用价值降低、青铜兵器相对普及导致了其从西周时期贵族身份的标志转变为东周时期武士身份的象征。

扁茎柳叶形青铜短剑从西周中期几近消失到战国时期重新流行，中间还存在缺环，其双重含义的产生很可能还受地区观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牵涉到它的起源、族属、流通、纹饰、工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 [1] 高西省：《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378—388页。
- [2]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四川文物》1992年第51期。
- [3] 钟少异：《试论扁茎剑》，《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4] 钟少异：《试论扁茎剑》，《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5] 高西省：《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378—388页。
- [6] 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年第4期。
- [7] 谭银萍：《试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谭银萍、崔钧平：《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文博》2019年第6期。

- [8]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 [9] 吕建昌：《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10] 李冬楠：《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11]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1996年第9期。
- [12]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钟少异：《试论扁茎剑》，《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宋治民：《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45—152页；朱世学：《巴式柳叶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 [13]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四川文物》1992年第S1期。
- [14] 高大伦、李映福：《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文物》1996年第3期；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年第4期；〔美〕孙岩：《西周时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113—122页；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谭银萍：《试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15] 高西省：《试论西周时期的扁茎柳叶形短剑》，《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378—388页。
- [16] 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第253—268页。
- [17]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3—723页。
- [18] 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
- [19] 林云：《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林云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 [20] 韩金秋：《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 [21] 周勇：《古巴蜀柳叶形青铜剑来源再探》，《新西部》（理论版）2013年第11期。
- [22] 吕建昌：《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23] 钟少异：《试论扁茎剑》，《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24] 李龙：《巴蜀青铜剑研究综述》，《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25]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1996年第9期。
- [26] 宝鸡市博物馆编：《宝鸡強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63、194页。
- [27] 勉县博物馆：《陕西勉县发现巴式青铜剑》，《考古》1992年第7期。
- [28] 宝鸡市博物馆编：《宝鸡強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 [29]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岐山工作队：《陕西岐山礼村附近周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38—44页。
- [3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17—118页。
- [31] 〔美〕孙岩：《西周时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113—122页。
- [32] 徐坚：《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 [33] 范晓佩：《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34] 李冬楠：《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35] 谭银萍：《试论西周青铜扁茎短剑》，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